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

曾纪鑫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曾纪鑫读史

上原

耻不并米徒古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高凉社聚

耻不并米徒古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下原

耻不并米徒古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高凉社聚

耻不并米徒古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上原

耻不并米徒古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高凉社聚

耻不并米徒古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下原

耻不并米徒古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高凉社聚

耻不并米徒古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上原

耻不并米徒古

耻不并米徒古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高凉社聚

耻不并米徒古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下原

耻不并米徒古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高凉社聚

耻不并米徒古

梁雄时也路真末路

上原

耻不并米徒古

中华女子学院



0393179

K209
76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

曾纪鑫读史

曾纪鑫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华女子学院
图书馆藏
章书图女

中华女子学院



0393179

© 曾纪鑫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 曾纪鑫读史 / 曾纪鑫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313-3859-8

I. ①一… II. ①曾… III. ①中国 — 历史 — 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7304 号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 曾纪鑫读史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姚宏越

责任校对 张广福

封面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2

插 页 2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新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85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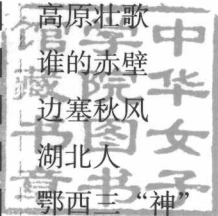
定价: 25.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6533311

目 录

- 001 昨天并未远去
020 英雄的出路与末路
043 从汴京到赵家堡
068 高原壮歌
085 谁的赤壁
105 边塞秋风
120 湖北人
130 鄂西三“神”
138 边缘化的沃土
147 西塞山下龙舟会
153 在北碚
167 天地过客
186 跋：你想走多远



昨天并未远去

——向阳湖“五七干校”回眸与反思

过去其实并没有真的过去，过去就活在今天。

——威廉·福克纳

许多时候，历史真的就是一种缘分。

谁也不曾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三角湖，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中突然跃出地表，引起世人的关注与凝眸。

这是一个位于湖北咸宁市北部的三角形湖泊，系斧头湖的一个湖汊，而斧头湖则属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想那远古之时，云梦泽与洞庭湖相接，一片汪洋恣肆、烟波浩渺、茫茫无涯的水面，带给人们的，该是怎样的壮阔与遐思？大禹治水，河流改道，水患甚烈的云梦泽消失了，后人只能在那发黄的古籍中搜寻、凭吊它的风姿与身影了。原属湖北省辖区的古云梦泽虽然不见了，但它的悲壮离去却给后世留下了影响至今的无数遗迹与“残骸”——那就是星罗棋布、数不胜数的大小湖泊，湖北也因此而得了个“千湖之省”的美誉。



昨天并未远去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

001



古云梦泽偏远闭塞，雾瘴弥漫，在统治者眼中，自然是一片适宜于流放者的土地。当年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受诬遭黜，出楚都，入云梦，过武汉，进湖南，自沉汨罗，虽无确切史料记载，但当他与长江相通的斧头湖擦肩而过时，想必也曾光顾并有所流连。直至北宋时期，距斧头湖东北约二百公里的黄州，还接纳过遭排挤受贬逐的一代文豪苏东坡。

于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流放是炼狱，逆境是动力，苦难是财富。屈原正是在流放的苦旅中，感受古云梦泽的遗绪，那大江大河的波谲云诡、云蒸霞蔚与瑰丽迷幻，感知普通民众的艰辛，对天地万物大胆质疑，胸间鼓荡翻卷着一股丰盈的想象、浪漫的诗意与“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热烈情怀，才如凤凰涅槃般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一首首想象奇特、感情奔放、文采华美、风格绚丽的优美诗篇。苏东坡因有流放黄州的自我“突围”，化痛苦为酵母，仰观俯视，探天地之本源，究人生之大义，才完成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广为传诵的千古绝唱。

自南宋始，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逐渐南移，原古云梦泽的地盘，已是繁荣昌盛的九省通衢之地。专制统治者认可的流放之地，要么一再南移，要么选择西北、东北等遥远的边塞所在。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于苏东坡贬谪黄州九百多年之后，历史再次“青睐”这块“风水宝地”，选中了三角湖作为一处新的规模宏大的特殊流放地。

千百年来，三角湖幽幽地、静静地躺在僻静的鲜为人知的角落，哪怕翻烂史书，也寻不到它的名字，见不到它的惊艳。唯有一次，三角湖差点卷入喧嚣的三国纷争。相传赤壁大战时，关羽曾在这里屯兵驻扎、引军据守，所以当地人又叫它关阳湖。当然，一场改变历史的大规模血战不可能在一个难以周旋的湖汉展开，因此载入史册的就只能是离它仅几十公里的长江赤壁。

寂寞惯了的关阳湖似乎并未感到冷落，可是，在那“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风暴席卷中华大地的特殊岁月，“与世无争”的它怎么也逃脱不了“接受改造”的宿命。湖汉宜于垦荒造田，将关阳湖拦腰截断，与斧头湖“隔离”开来，抽干湖水，裸露而出的黑色湖泥，就是片片肥沃的良田了。1968年冬，四万多民工浩浩荡荡地开进关阳湖，风声猎猎，红旗招展，不到半年时间筑起了一道长达二十八公里的围堤，堤内垦区面积四万八千亩。

尽管如此，关阳湖仍只在有限的区域范围内绑缚在时代的车轮上滑行。然而，车轮一旦转动就无法停止，帷幕一旦拉开就难以闭合。1969年，关阳

湖在因缘际会的历史背景下，终于完成了实质性的突变与飞跃，成为举世闻名的“五七干校”校址，选定在围湖造田工程刚刚结束的关阳湖垦区！

于是，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如潮水般从北京涌来，涌向咸宁关阳湖。

这是一场罕见的文人大迁徙，一种带有改造与惩罚意味的下放，更是全国轰轰烈烈的“五七干校”运动的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统计，共有六千多名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先后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思想改造。当时有首流行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唱道：“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不怕风吹和雨打，我们永远不离开它……”为表示人心向党向太阳，意志坚定跟党走，关阳湖更名为向阳湖，昔日的“三角湖”、“关阳湖”就此“退居二线”。于是，进入世人与历史视野的，便是向阳湖“五七干校”。与此同时，向阳湖周边的一些地方也相应地更名为向阳中学、向阳塔、向阳路、向阳桥……

这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放浪潮既与古代官员的遭贬流放有着某些相同之处，同时又打上了特有的时代烙印。

当时全国约有一千万名各级干部，而进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即达五百多万人。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全国中央一级机关开办的干校有一百零六所，各省开办的共计一千四百九十七所。咸宁向阳湖能在如此众多的“五七干校”中“脱颖而出”，知名度最高，不仅在于它是全国当时规模最大的“五七干校”，更在于下放这里的，是一支由中国文化部系统（包括机关、出版、文物、电影等）以及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组成的文化大军，他们中既有文化界的高级领导，如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文化部原副部长、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文化部原代部长周巍峙等，也有作家、诗人、画家、导演、书法家、音乐家、摄影家、翻译家、出版家，还有编辑家、文物专家、语言学家……其中不乏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大家与名家，如作家沈从文、冯雪峰、冰心、萧乾、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诗人张光年、臧克家、郭小川、李季、绿原、牛汉，剧作家孟超、陈白尘，翻译家金人、孙用、许磊然、文洁若，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冯牧、阎纲，画家刘继卣、邵宇、李平凡、秦岭云、卢光照、许麟庐、林锴、曹辛之、范曾，书法家李长路、刘炳森、谢冰岩、佟韦，出版家陈翰伯、王子野、金灿然、史枚、陈原、王益、王仿子、范用，文博专家吴仲超、唐兰、单士元、王冶秋、龙潜、徐邦达、史树青、王世襄、罗哲文，学者宋云彬、





赵守俨、陈迺冬、王利器、顾学颀、傅振伦、周绍良、周汝昌、舒芜、程代熙，电影工作者司徒慧敏、吴雪、马彦祥、唐瑜、洪臧，等等。

迫于当时情形，京城文化干部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势在必然，而选择咸宁向阳湖，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偶然之中也包含着必然因素，如果没有远离京城的偏僻寂静，没有前期的民工围垦，没有足以接纳数千人的空间地盘，无论怎么偶然，也不会凭空出现一个闻名遐迩的向阳湖“五七干校”来。

偶然与必然相结合，历史老人就这样锁定了咸宁，选择了向阳湖。于是，一段闪电般掠过的特殊日子，就此载入史册，成为人们不断咀嚼、不断回味、不断反思的永恒话题。

二

一声令下，属于文化部系统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电影公司、新华书店总店等单位以及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大部分文化干部的命运便无可逆转地与咸宁向阳湖绑在了一起。当然，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一锅端”地全部遣送，京城所有文化部门不可能完全停止运转，咸宁接收、“消化”也需要一个过程。留下的“根红苗正”，下放的是有“辫子”可抓、“尾巴”可割的改造对象。根据“轻重缓急”，他们分期分批地离开京城。1969年4月12日，先遣队抵达向阳湖；9月26日，第一批“人马”离京遣往咸宁；12月19日下放第二批；1970年5月18日，又有第三批来到向阳湖。有孤身一人前往，有夫妻同行，还有拖家带口全家迁移的。离京之时，他们不知道何日才能返回，心头充满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离绪别愁与凄凉怅惘，许多人做好了今生今世终老咸宁的准备，下了“把骨灰撒在向阳湖”的决心。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在《牛棚日记》中就写道：“如今一去，恐怕真个永不回来了。”

第一批学员刚到咸宁，真可谓百废待兴。没有房屋，只有借住在向阳湖周边地区的老乡家中。不待喘息调整，就开始白手起家地修建宿舍，因陋就简地填筑道路、加固围堤、开荒造田。昨天还在手握笔杆舞文弄墨，今天就得改弦更辙，开始脱胎换骨的体力劳动改造：拿镢头，握锄头，举榔头，挥

铁锹，舞镰刀，打赤脚，挑重担，风里雨里，摸爬滚打，肩头磨破皮，双手长老茧，头上落尘土，浑身是稀泥……几乎一夜之间，就得以一种全新的面貌与生活方式生存于世。这对农村出来的少数文化干部而言自然算不了什么，而对大多数从小吟哦诗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市子弟来说，不啻于一种折磨与受罪。特别是那些生长于北方的文人，走不惯南方的泥泞路面，一不留神就会摔个仰面朝天；更受不了南方的酷暑炎热与阴冷潮湿，腰疼，关节疼，胸口发闷，简直难受得要命；此外，还要对付草中的毒蛇，水中的蚂蟥，夜晚的蚊虫……

体力劳动容易使人麻木，在全身疲惫与腰酸背痛中，思维的活动降到最低点，一有空闲只想休息放松，呼噜呼噜睡大觉。而最要命的是，伴随沉重的体力劳动，还有人为的洗心革面的思想整风，将松弛的神经激活，从思想到灵魂进行深刻的反省。劳动间歇，要开斗争会，批斗那些所谓有历史污点的“走资派”、“右派”与“反革命分子”。雨天或晚上则安排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理论学习活动，不间断地开展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政治运动。著名诗人郭小川说他白天“经常泡在膝盖深的沼泽水中，到晚上还不断开会”。除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干校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讲用、搞运动、搞大批判、搞思想改造、忆苦思甜、访贫问苦、表决心等。

关于当时的劳动及“洗脑”情形，干校部分学员在后来的访谈与追忆性文章中有所提及，但多属概述性文字，唯有著名诗人，《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张光年的《向阳日记》以及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所叙最为具体翔实。

1970年1月21日 晨六时起床天未大亮，入厕后扫院子。我连一批人参加修堤，七时吃早饭。饭后到沙场挖沙。午饭后未及休息，下午提早于一时上工，继续挖沙，紧张而又扎扎实实地干了一天。晚七时补“天天读”，班里革命同志安排开讲用会。我要求检查批斗自己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班长同意安排时间。八时“天天听”。痔疮肿胀，坐浴半小时。十时半开始睡眠。

1970年2月4日 我没有直接上大堤干活，而是同陈白尘、张天翼等等一起整修取土挖出的一段高坎，从早七时干到晚七时，中午也在那里吃饭，晚上摸黑回家。幸好我带了电筒，起了一点作用。





晚饭后已近八时，在食堂购点心一斤。班上补“天天读”。自学，读报，热敷。连日痔疮坐盆热敷，略有缩小。

以上摘自张光年的《向阳日记》，我们再从陈白尘的《牛棚日记》中摘出有关记载：

1970年3月12日 晨起雨雪霏霏，但仍然出工。坚持到下午三时，衣衫鞋袜尽湿，才收工返去。未整队，各自奔跑，我落了单。路上油滑难行，过浮桥时几乎落水；上大堤更是一步三滑，跌倒两次。在堤上举目四顾，只有去农中的路上有人，追去，却是十四连的人；急由抽水站再回大堤，幸遇王真，乃同行。我已迷不识路了，王又误引至电影口五大队，绕道而返。此时雷鸣风吼，冰雪交加，身如飞蓬，足如蹭油，失足者再。五时才回到连部。里外四条裤子以及棉袄、背心、罩衫等等都已湿透，短筒雨靴灌水已满，大为狼狈！换衣洗脚后，生火烤湿衣至十时半。还有许多同志怕连换的衣裳都没有了，不知如何度此寒夜？

摘引上述两段，为的是使读者对向阳湖“五七干校”，对当年知识分子遭受的身与心的折磨产生一定的感性认识。当事人的原始记录，比其他任何人的描述都更贴切、生动而到位。

劳动、整风、学习、批斗、反省、检讨，此外，他们还要默默地承受另一种人为的负担与重荷——形式主义的瞎指挥。

一次，韦君宜受命与舒芜挖坑修建临时厕所，一番艰辛劳作，累得大汗淋漓，总算挖好了一个大坑，两个人还颇有情调地将坑的边缘修得光光溜溜。正在欣赏自己的“杰作”，上级突然传达新的命令，厕所要改建，得挖在另外的地方。他们不敢有半点分辩，对那个白挖的大坑一番“凭吊”之后，唯有老老实实地执行新的任务去也。

再比如，眼看就要下雨了，却下令猛割小麦，结果无法运送，只有烂在田头；筛沙遇雨，仍不收工，而沙子被雨淋湿，就会凝结成团，既难以筛动，也达不到规定的要求；还在深夜经常性地突击劳动，打谷不止，凌晨方归，稍事休息，又得下田大干，人的精力与能量毕竟有限，其实效率极低，

真是应了农村的一句歇后语：顶起碓臼唱戏——人吃了亏，戏又不好看……

这一切，被当地的咸宁老乡看在眼里，就有了“身穿破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棍，三步两跌倒”，“小雨小干，大雨大干，出太阳不干（开会）”，“文化部不文化，干起活来挺泼辣”等民谣。

三

“文革”时期，全国上下只有一个脑袋在思考，一个声音在回响，此外全属异端。而知识分子凡事总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对一些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不像其他阶层那样一味盲从。但凡独特的认识，多有偏离“正轨”之嫌，就有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说。劳动的含义，在此被规范、定义在一个相当狭隘的框架之内，脑力劳动被剔除出列，唯有体力劳动才算正宗，才叫劳动。

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化干部，无论老弱病残，所有人都得参加体力劳动，盖房、开荒、挑担、施肥、插秧、割谷、扬场、种麦、挖煤、烧窑、种菜、养猪、养羊、放鸭……但凡当地农民的活路，他们都得尝试着老老实实地去做，不得有半点偷懒之嫌。所不同的是，年纪大、身体弱、病患者干轻省一些的事儿；年轻的、体质好的干重活，不亚于当地农民中的正式劳力。体力劳动的技术含量低，知识分子脑袋灵光，很多事情自然是一学就会，一点就通，时间一长，也就适应了，习惯了。种的稻谷、麦子、蔬菜，养的猪、羊、鸭不仅自给，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还有盈余，可上缴国家。

向阳湖“五七干校”成立于1969年9月，正式终结于1974年12月16日，名义上存在了五年多时间。而自1971年底，就有故宫专业人员等开始陆续调回北京，1973年底，大部分文化干部已从向阳湖离开。因此，向阳湖“五七干校”实际存在了四年多时间。

四年多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关键的是，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人数之多，名人密度之高，不仅在中国文化史，即使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后恐怕也难有如此荒谬的大规模流放事件了。因此，用“空前绝后”一词形容向阳湖“五七干校”，半点也不为过。“文化”一词，搁在今天早已被说烂用滥，无论什么物事，总要打上“文化”的招牌，仿佛只要沾上文化的边儿，就能点石成金，价值倍增。这是文化的



昨天并未远去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



荣耀，也是文化的悲哀。在中国，一旦什么物事成为趋之若鹜的时髦，必定被人利用，变味走形，令人不敢接近与正视。而作为一块被真正的中国文化人的血汗与苦泪浸泡过的土地，改造与影响自然是双向互动的，向阳湖在塑造着他们身与心的同时，他们又给向阳湖留下了一些什么呢？受其影响，今天的向阳湖会是一种怎样的情状呢？

2007年11月，中国第八届艺术节在湖北举行，借出差之机，我去了一趟向阳湖。

从武汉到咸宁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温泉，不过两小时车程；从温泉到咸安区，再从咸安到原文化部“五七干校”机关旧址，建有一条宽敞平坦，长约十八公里的公路，小车一刻多钟即可到达。专程陪同前往的咸宁市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城外告诉我，公路是新修的，当年，数千名“五七干校”学员不可能同居一地，而是散居在方圆十多里的范围之内。向阳湖地处偏僻，物质、文化生活都相当落后，学员们购物、理发、拍发电报、探亲返家，不得不经常往返于驻地与咸安之间，没有车辆，只有靠两条腿丈量，有时背着大包小裹，一走就是大半天时间。尽管如此，能够如此往返，这于当时的干校学员而言，也算得上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因为毕竟暂时摆脱了强加于身的劳动改造与整风批斗。

咸宁“五七干校”正式解散，向阳湖移交当地政府，不久成立了咸宁县国营向阳湖农场。几千人先后离去，向阳湖“人去楼空”，农场难以为继，开垦出来的田地不再种植庄稼，很快被生命力极其旺盛的野草所覆盖，成了一片适合放牧的草场。于是，向阳湖奶牛良种场应运而生。昔日湖汉变滩涂，垦荒为良田，今日田地生杂草，草地变牧场，短短的时间内，向阳湖可谓大起大落，饱经沧桑。

“五七干校”机关旧址位于“四五二”高地，因其海拔高度四十五点二米，故名。湖区是一览无余的平原，这儿算得上一处制高点，可远眺向阳湖，1981年更名为观湖墩。坐落其上的“五七干校”机关旧址现已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门外立有一块两米多高的长方体“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纪念碑。走近两扇红漆斑驳黯淡的窗式铁门，“五七”、“干校”四字分别焊接在左右门扇的直立钢筋上，字号之大之凸之显赫，令人触目惊心，过去的一幕犹在眼前。可进入铁门，里面却是一片寂静，唯有几幢当年的红砖红瓦平房，在默默地诉说着当年的历史与喧嚣。三十多年的岁月悄然流逝，当

年不少学员已然作古，即使年轻人，也进入了老迈之年。院内空空荡荡，除我们一行外，见不到一个人影。我在平房的廊檐下走着，总想发现一点什么，抓住一点什么。每扇门前，我都要停留片刻，以搜寻当年遗留的点滴印痕，在空寂寥落的当下与轰轰烈烈的“五七干校”之间，串起一条贯通的纽带。突然，我的眼前一亮，但见一扇房门旁的一块白色牌子上醒目地写着：“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雪峰旧居”。哦，冯雪峰，就是那个与鲁迅有着深厚情谊，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冯雪峰！门上挂一把小小的铜锁，而窗户却是开着的，透过钢筋窗棂，我极力地搜寻着，终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但又确乎感到了冯雪峰留下的身影乃至体温。一路看下来，还有著名诗人郭小川，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著名文物鉴赏家、《锦灰堆》作者王世襄，著名出版家、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子野等人的旧居。然后呢，是向阳湖奶牛良种场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看来当年的房屋终归派上了新的用场。还有一间是破产企业管理人办公室。破产企业？所指何也？不过这一念头只在脑海一闪就消失了，我没有深究，也没有必要作此深究。

游览向阳湖“五七干校”机关旧址的最大收获与惊喜，就是见到了李城外等有识之士与相关单位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向阳湖文化展览厅。里面陈列着当年学员们用过的各式农具、留下的各种生活用品，那些今天业已消失的蓑衣、马灯、煤油灯、茶缸等物件，则显得尤为珍贵。一路看下来，当年学员创作的诗歌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诗的质量倒在其次，关键在于抒发了他们决心刻苦改造自己的火热胸怀，诗中所流露的真挚情感让人感慨万端、深思不已。其中一首署名“五大队十七连朱思及”的《扬场》颇具代表性，不妨抄录如下：

机声震落垛上露，战士笑看太阳出。一片稻场黄入天，万堆谷山出平湖。

透过一张张发黄的纸片，看得出这是一些未经“篡改”，算得上“原汤原汁”的“真迹”。“五七干校”停办，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向阳湖“五七干校”作为一处不堪回首的“文革”遗迹，谁也不愿正面触及，一些珍贵物件就此销声匿迹、湮没无闻。等到人们认识其价值，再来重拾旧缘，就显得



昨天并未远去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



十分困难了。2000年6月6日，在李城外的发起与组织下，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应运而生，一群有志之士知难而上，从历史的河流中一点点地打捞、积累，当地政府终于建成了这一纪念馆式的实物展览。

向阳湖文化研究会迄今已拥有会员一百多名，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收集资料，搜寻遗物，采访干校学员及周边乡亲，不断研究，撰写文章，有力地丰富了向阳湖文化的内涵。会长李城外自不待言，副会长罗勇毫无保留地给我提供资料，副会长兼秘书长、《楚天声屏报·咸宁版》总编辑金戈，理事陈海燕、万红英等人也向我叙说了当年干校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与真相。

没有他们的努力，我前来此地，面对的会是一些什么？只能是一片黯然无色的空白与虚无，一切的一切，将从何说起？

四

第一批文化干部刚到咸宁“五七干校”，一下子难以适应当地环境，所带物品也有限，便到就近的向阳湖镇（原甘棠公社）购买。虽然下放农村了，但他们仍领取国家工资，根据不同级别，每人每月一百元至五百元不等，个别干部甚至更高。以当时物价而言，一百元人民币，抵得上一名当地农民一年的所有收入了。因此，学员们极强的需求欲与购买力，一下子就将镇供销社的所有商品“抢购”一空。这对消费水平有限的当地人来说，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与“新闻”了。商店赶紧进货，并对学员限量供应。于是，这些京城下来的不懂农活的“秀才”们，在老百姓眼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款”。

干校学员一年难得上几趟县城，去得最多的，就是向阳湖镇，购物在甘棠街供销社，看病上一九五医院。在一股强烈的怀旧情绪笼罩下，他们将甘棠街供销社亲昵地称为“小东安市场”、“干校的王府井”。第一批学员下放之初，干校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做起，学员分别住在附近农民家中。他们最初的劳动，便是建干打垒的房子，有一个寄身的落脚之处。随之而来的第二批、第三批学员，便不必寄宿老乡家中了。因此，向阳湖干校存在的几年时间里，除当初的短暂时间外，不仅干校学员与当地农民接触较少，就是学员与学员之间，因散居在窑嘴、祝家塆村等向阳湖方圆十多里的十几个村庄，即使是不同连队，相互间的交流也较少。

副会长罗勇告诉我，1970年初，年届七十的冰心下放向阳湖，劳动改造之余，为人题写对联。当地农民见状，视为稀罕纷纷跑来观看，皆赞不绝口地叹道：“没想到一个老太婆，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当然，他们更没想到的是，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比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不知高超多少倍的享誉世界文坛的大作家。

这是时代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当然，只要我们客观一些，进入视野的也不全是悲哀，也有某些积极的、正面的因素，苦痛之中不乏笑声。

在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社会的良心、正义、道德与楷模，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以介入社会与政治为己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因此，如果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化艺术和社会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完全与农民、工人等普通民众脱节，对他们的生活疾苦漠然不知，必然陷入狭隘的圈子，难有大的作为。适当的接触体验与社会实践，无疑能够拓宽他们的视野与研究领域，在一种提升与超拔中，进入新的境界，“劳动的汗水有力地冲刷着一些干部身上的官、暮、骄、娇四气”。特别是对一些在京城挨整的人来说，来到向阳湖不啻为一种解脱。这里虽然也有运动，毕竟偏远，不像京城动真格的，而是雷声大，雨点小。臧克家来咸宁“五七干校”后，不仅挨整比过去少，还可与家人团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改造，臧克家的饭量有所增加，失眠症没有了；过去只与少数的几个领导联系，来干校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增进了与普通干部之间的了解，融洽了相互间的关系。据萧乾回忆，咸宁的农民朴实勤劳，对下放干部不仅不欺生不歧视，而且非常热情，在感受到普通百姓传统美德的同时，也对他们的疾苦有所了解，对中国的国情与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早春在接受李城外的采访时说：“我个人体会，住到农村才真正谈得上了解农民。知识分子不能老唱高调，身居高楼大厦，不问民间疾苦。”又说：“向阳湖使我懂得了国情民情与友情。”还有不少人说，有向阳湖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经历了干校生活，其他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

许多年过去，不少下放文人回首向阳湖，忆及当年，抛却一些空洞的观念与概念，总能在一些微小的生活细节中感到一股少有的温暖慰藉与精神支撑。据李城外《向阳湖畔丛桂香》一文所记，著名学者王利器谈及昔日干校





的人和事时，十分动情，“初到向阳湖，干校人没有房子住，老乡就一户户腾；干校人不会干农活，老乡便手把手教。就连有的老乡子女结婚，也会提前通知干校人，当‘上宾’，请吃喜酒。”

著名画家秦岭云下放咸宁时年龄偏大，照顾他在湖边看水泵。进入眼帘的是荡漾的碧波与展翅的天鹅，闻到的是荷花的飘香与泥土的芬芳，听取的是蛙声蝉鸣与大自然的天籁……他陶醉于向阳湖的美景，忘却了心中的压抑与痛苦，将苦难化作力量与酵母，绘出了一幅幅表现向阳湖风光的优秀国画作品。他不仅在当时偷偷地画，返京后仍常画向阳湖不止，在对向阳湖美景与神韵的勾勒中，艺术水平与精神境界得到了质的飞跃。

王世襄在一次买鱼时认识了当地渔民韩祖祥，两个人聊得十分投机。此后，王世襄常随他下湖捕鱼，并赋诗为证：“专家湾下是渔家，半住茅庐半泛槎。多谢打鱼将我去，顿时欢喜放心花。”在长期的接触交往中，王世襄与韩祖祥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返京后，王世襄撰文纪念，还将当年创作的《观渔十首并序》用毛笔誊抄，寄给韩家父子，预约重返向阳湖一叙旧情。

虽处困境，遭受磨难，但是，干校学员只要提及向阳湖，无不怀有一股温情，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态，说向阳湖庇护、抚慰过苦难，这里的空气比北京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那么和谐，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被揪出来的所谓“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文人”，更认为向阳湖是一个难得的避难所。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干校学员与当地农民之间的帮助、作用与影响也是双向的，互动的。比如著名导演、表演艺术家吴雪被特邀指导当地文工团排演阳新现代采茶戏《石头岭》，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指导与排练，《石头岭》大获成功，不仅在咸宁、阳新巡回演出，作为一个业余文艺团队，还参加了湖北省专业剧团的剧目会演。更重要的是，吴雪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著追求，对演员的严格要求感染了当地的文艺工作者，那点石成金的艺术见解更是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提升了他们的艺术水准。此外，干校还安排画家为当地筹办咸宁农业展览，刘炳森为当地阶级教育展览撰写解说词，范曾等人帮助咸宁火车站画毛泽东主席像、写语录牌，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

然而，干校学员劳动在自成体系的向阳湖新垦区，居住在相对独立的新建连队宿舍，也就是六千多名知识分子及其家属与当地普通农民（时称“公社社员”）各个分离，无论劳动生产，还是生活学习，基本处于“隔离”状

态，别说难以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即使一般交往，也少之又少。即如王世襄与渔民韩祖祥一家的接触，也是王世襄利用星期天及其他休息时间离开干校外出，在长期的买鱼、观渔、聊天过程中，才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而这种交往在学员与农民之间并不多见。

因此，尽管知识分子数量庞大，时间也不是太短，比如牛汉在向阳湖就待了五年零四个月，而他们对当地农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等方面的影响简直微乎其微。

看完咸宁“五七干校”机关旧址，一行人前往向阳湖。小车在一条土路上颠簸而行，原来这条相对宽敞的土路，就是干校学员留下的“真迹”——当年的“五七大道”。有一首向阳湖干校歌曲，其中一句唱的就是“五七道上迈大步”。“五七干校”对基础建设十分重视，“安居”才能“乐业”，首先是建房，然后是修路建桥、加固围堤。围堤依然耸立，昔日的五七桥、红旗桥犹存，特别是红旗桥，可算得上中国建桥史上一座最为别致的桥梁了——数十个双层大号水泥管子一个接一个地拼在一起，贯通滢河两岸，上铺岩石水泥供人行走，洪水时节，暴涨的雨水可从一个个口径粗大的涵管快速通过。我在一张旧照片上见到了当年这座名叫红旗桥，实为涵洞桥的“盛况”，为确保安全，桥的左右两边，用树木、棍棒架设了简易栏杆，约有二十多位干校学员头戴斗笠，挽着裤管，排成一字形长队，正从桥面通过，打头的举着一面红旗（可见红旗桥名不虚传），一群人似乎都显得神圣而庄严。

到了向阳湖边，车停十字路口，我走上右边的湖堤，信步向前，但见堤坝两边的斜坡满是枯黄的野草，湖中残荷败草斜斜地浮现在冬日浅浅的水面。突然，一股打旋的风儿卷着尘埃、枯叶刮过，我稍稍侧身躲避，而内心深处感到的却是寂静，一种喧嚣过后的静得不能再静的寂静！

“水过地皮湿”，这时，我的心头突然涌出这么一句民谚。是的，“五七干校”潮水似的涌过之后，给向阳湖，给咸宁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

路口的一边，临湖搭着一间简陋的鸭棚，一群鸭子嘎嘎嘎欢快地叫着，将一塘池水搅得一片浑浊。陈白尘当年就是一名专业鸭倌，与鸭群为伍，苦中作乐，感受一段别致而苍凉的人生。他在《忆鸭群》中写道：“三年半干校生活中，是谁和我相处最久而又感情最深？如果朋友们不见怪，我要回答：是鸭子。”当然，此鸭非彼鸭，如今这座鸭棚，这群鸭子，与当年的“五七干校”，与陈白尘，已无半点因缘。分散在方圆十多里的干校住房多已拆除，堤



昨天并未远去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